

究中心亚洲经济政策研究员。)

(本期新闻部分责任编辑：余居道)

## 焦点分析

### 美国“足迹”漫步东南亚

欧内斯特·Z·鲍尔(Ernest Z. Bower)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 2 月 3 日撰文：过去的两周里，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Leon Panetta）以及包括太平洋军区司令、海军上将威拉德（Robert F. Willard）在内的重要官员频频阐述总统奥巴马 1 月 5 日宣布的新国防预算及其对亚太地区的影响，东南亚国家希望弄清楚美国的意图，以便评估中国的反应，并在国内的政治论述中体现与美国的联合意图。

#### 全面接触

正当美国采取一系列行动实施奥巴马“重回”亚洲的政策许诺时，其政策制定者应该投入大量的时间向亚太地区的同僚们阐述美国的意图。需要重点指出，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扩大在该地区的存在力量是全面战略规划的一部分，其中包括稳健的经济和政治接触。换句话说，美国必须澄清其亚太战略并不是一种以安全为主导的策略，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长期承诺。美国重申对该地区长久以来的安全和经济承诺，并增进了新的政治思维。

#### 平衡是关键

平衡各方力量是美国新亚太战略的关键。美国意图通过经济竞争力加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如果亚洲国家对此不买账，那么他们也不会接受“重返”亚太策略中的安全策略。采取具体的行动措施十分重要，例如：继续保持高层对贸易的关注度——具体来说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向美国民众解释亚洲贸易对美国经济复苏和长期增长的贡献；欢迎来自亚洲的投

资；表明在东亚峰会上讨论经济和金融问题的意愿；组织由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组成的总统和/或内阁级别企业代表团到该地区访问。理解美国与该地区的种种联系并扩展美国官员在该地区的讨论话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成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动指南。

## 安抚中国

东南亚国家需要美国明确其意图，也要理解美国的终极目标是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美国行之有效的可持续宏伟战略目标应该使中国相信其能够获得能源、食品和水资源等安全目标并在地区安全和贸易框架内扩张经济影响力。

因为不知道中国的目标，本地区各国早已忧心忡忡。未来几十年中国将何去何从也疑云重重。打造经济强国，保持经济增长十分受欢迎，然而中国利用这种新实力试图在有争议的地区（包括南中国海、中印边界以及其他地区）宣称主权则已经给邻国敲响了警钟。展望今年中国高层的换届，即使最杰出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也不能确切地描述决定未来中国态势的关键因素。

自相矛盾地是，尽管中国的不确定性促使东南亚国家鼓励美国在该地区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凸显出他们担忧美国重返该地区不是为了抑制或反对中国。

东南亚国家现在确信美国经济不会螺旋式下滑：经济复苏的迹象鼓励了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相信美国模式会继续发挥其作用并产生积极的结果。此外，对“G-2”的担心也已销声匿迹。尽管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并稳定下来，但两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依然针锋相对。没有哪一个东南亚国家希望美中之间发起一场新冷战。幸运的是，北京和华盛顿方面似乎在这一问题上也达成了一致意见。

## 轮流，而不是基地

从战术上讲，直接对话并保持言行一致是美国的制胜之策。从战略上讲，美国必须不断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关系。美国需要聆听并理解传统盟国以及新盟国的所需所想。美国在亚洲的新防御策略已经体现出了这一姿态。海军上将威拉德指出“新防御策略的重点是轮流，而不是基地”，表明美国将会扩大在亚洲地区的足迹。

如果执行得当并坚持如一，这会是一种十分聪明的可持续策略。未来几十年，亚洲将可能看到美国力量以一种新的形式存在下去：共享设施、强调协作、进行联合军演；更重要的是发起包

括人道援助和赈灾在内的公益活动。这一目标不仅包括了澳大利亚、菲律宾和亚洲在内的盟约国，未来还会扩展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印度尼西亚。

终极目标是把中国也纳入该策略。过去美国已多次邀请中国参加代号为“金色眼镜蛇”的地区军事演习，中国是否接受邀请可作为评估此战略的重要标准。建立互信并扩展与中国军方的关系是美国的长期目标。该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安抚美国在东南亚的伙伴国，并有望在世界上最活跃地区实现和平与繁荣的双重红利。

（王子磊译，余居道校）

## 《纽约时报》：为何中国与俄一道否决叙利亚决议草案？

**美核心提示：**《纽约时报》2月7日发表裴敏新撰写的题为“**Why Beijing Votes With Moscow**”的评论称，事实上，促使中国作出投票否决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这一决定的最重要因素与北京-大马士革的关系一点都不沾边，这一决定完全是因为北京与莫斯科的外交合作。全文如下：

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国决定与俄罗斯一起投票否决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都有悖常情。这两国的否决票不仅破坏了向阿萨德政权施压结束其血腥镇压活动的努力，而且还损害了中国与西方和阿拉伯联盟的关系，这项决议是由阿盟提出的。

事实上，促使中国作出这一决定的最重要因素与北京和大马士革的关系一点都不沾边，这一决定完全是因为北京与莫斯科的外交合作。

自从1971年重返联合国后，中国在安理会中一直不太喜欢行使否决权。在自己不支持的问题上，中国通常会选择投弃权票。当中国确实使用否决权的时候——中国只投过八次否决票——这些问题通常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说都很重要。

例如1972年8月，中国支持巴基斯坦阻止孟加拉国进入联合国，当时孟加拉刚刚从巴基斯坦获得独立，而巴基斯坦则是中国的盟友。2007年1月，中国同俄罗斯一起否决了对缅甸实施制裁的一项措施，当时缅甸是中国的附庸国。2008年7月，中国又与俄罗斯一起扼杀了一项惩罚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政权的决议。津巴布韦也是北京的一个盟友。

然而，中国在叙利亚身上行使其宝贵的否决权似乎很奇怪。中国在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战略或者经济利益。然而，在中国在安理会投出的8次否决票中，有两次都与现在的叙利亚有关。第一次是在2011年10月，当时中国与俄罗斯一起阻止了欧洲支持的一项制裁决议。

在务实的中国人眼中，不值得为阿萨德政权投一张否决票。但是在叙利亚有着经济和安全利益的俄罗斯人反对这项决议，所以中国明显觉得，最好不要损害与俄罗斯的关系；否则的话，北京今后就无法获得俄罗斯的支持。

俄罗斯和中国形成的这一障碍轴心现在在安理会的决策过程中成为了关键变量。两国似乎达成了一种战略上的共识——他们将在对抗西方的过程中协同作战，这样谁看上去也不孤立。中国在对莫斯科更关键的问题上（例如叙利亚问题）尊重俄罗斯的意见，而俄罗斯在中国最关心的问题（例如津巴布韦和缅甸）支持中国。

因此，为了让决议通过，西方通常要说服这两国中的一个（大多数情况下是俄罗斯）放弃反对立场；通常的做法是放松拟议中的制裁。俄罗斯一般比中国更加不合作，中国则更愿意让俄罗斯去承担得罪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在与伊朗相关的问题上，西方一直把重点放在赢得俄罗斯的支持上。

让北京的天平朝着使用否决权的方向倾斜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对民主变革的厌恶。

自从阿拉伯之春让中东长期执政的独裁政权倒台以来，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就一直不遗余力地从负面角度报道中东的事件。由于担心在中国出现类似的动荡，共产党加紧了审查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如果推翻阿萨德政权，特别是安理会采取的行动的的话，会鼓励北京和莫斯科亲民主的反对派。

中国领导人知道，他们的否决票会损害与西方的关系。但是，他们似乎认为即使投弃权票或者赞同票，也不会有太多好处。中国一位著名的外交政策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因为人权问题，中国在西方眼中的形象一直不好，即使中国与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合作，也不会赢得任何好感，也不会得到西方媒体的肯定。

他可能说得对。但是中国领导人会发现他们投否决票也并非无须付出任何代价。这注定会损害他们花大力气在西方粉饰自己形象的种种做法，包括进行公关活动，建立英文新闻网。

假若“俄罗斯之春”在某一天成功地让普京下台的话，北京就会发现自己成为了安理会中仅剩的唯一一个独裁大国。

（作者裴敏欣是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

（牛俊供稿）